



“云淡风轻”一般用来描述一个人沉静而淡然处世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用来形容张友伦先生也很贴切。张先生自然流露出的这种气质,实际上是经过风驰云卷的激荡与承艰负重的锤炼而成的。

张友伦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留学苏联,60年代回国后一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直至退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几度赴美国访问研究,在国际共运史和美国史两个领域都卓有建树。他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生涯见证了世界史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同时,在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尤其是美国史学界,张先生在学术研究、梯队建设和学科谋划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推动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纵深发展;他指导过硕博研究生共计三十余位,其中许多已经成为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栋梁之材和骨干力量,张先生堪称“中国世界史学界老一代和新一代史学家的桥梁”。

1931年5月,张友伦先生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一个殷实的家庭,初、高中就读于蜀华中学,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张先生不是一个乐于享受安逸的人,恰恰相反,他还自讨“苦”吃,坚定地把握机会,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期作出明智的决策;在学术道路上选择迎难而上,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张友伦先生在回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时坦诚说道,家境比较富裕的孩子,在旧社会大染缸里很容易失足,成为浪荡子弟;他曾在歧路前徘徊,幸亏有私塾杨老师指点迷津,才没有误入歧途。这位私塾先生除了让他念“四书”外,还让他熟读《座右铭》和《陋室铭》。到了青年时期,他体会到,这两文提倡的宽厚待人、为人低调、安贫乐道、不追求虚荣与享受等人原则很有道理,并愿意将之奉为今后行为的准则,行之恒以。

第二次为我指点迷津的不是个人,而是中国共产党,张友伦先生曾说,“1950年底我在成都专科学校毕业,在校等候分配,最担心的就是不给我的工作。我出身地主家庭,而且有一次政治考试不及格。”不想,张先生当时因成绩优秀被分配到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我顿时欣喜若狂,觉得党和国家没有抛弃我,是再造我的大恩人。我曾经有过的自暴自弃的想法一扫而光。我开始走上了正道。”1953年,张友伦先生入党后,又以优异成绩通过留学苏联的考试,到了列宁格勒大学(即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习外国历史。原本学会会计的他改学历史,且没有俄语基础,但凭刻苦勤奋的钻研精神和“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日”的拼搏劲头,张先生慢慢攻克难关,学有所成。

与张友伦先生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一贯不喜欢表现自己,言语不多,但言出必行,他那朴实淡定的形象,折射出来的是平日里的韬光养晦和勤奋刻苦。上世纪60年代初从苏联学成回国后,张友伦先生先后在南开大学国际共运史教研室和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工作,1977年调入美国史研究室,从世界通史到地区国别史,语种和专业内容均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没有三四年时间是很难适应的。作为一名党员,张友伦先生服从组织分配,没有任何抱怨与牢骚。俗话说“四十不学艺”,当时张先生已经46岁了,英语零基础,克服语言关也是摆在面前的一大难题。但仅用了两年时间,他就成功地调整了专业方向,英语水平也有了巨大进步,具备了在美国史研究室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资格。这是一种何等强大的心理素质和专业雄心!

1986年至1990年,张友伦先生出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其间他对美国史学科的发展倾注了很大心力。有一段时期,老教师陆续退休,年轻教师尚待成长,美国史研究室一度陷入低谷,张友伦先生殚精竭虑,一心要保南开的美国史学科于不坠,并在困境中求得发展壮大。尤其在鼓励和扶持年轻人成长方面,张先生用力最多,许多事迹在南开至今有口皆碑。作为承上启下的学术带头人,张先生在南开美国史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期扮演了关键角色。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云淡风轻话平生

张友伦先生的人生道路与史学成就

杨念侠



张友伦先生曾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长达十年之久(1986年至1996年,现为研究会顾问)。这个学术团体创建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是中国美国史学人共有的学术平台,对美国史研究和教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老一代学者退出研究会领导岗位之后,张友伦先生担负起了承上启下的重任。那十年间,研究会处在一个难题层出不穷的时期,特别是1990年研究会秘书处搬到南开大学以后,张友伦先生身上的担子变得更重。按照本意,他早就想从理事长的位子退下来,但由于工作需要和大家的信任,他一直勉力支持,领导研究会渡过难关,并且取得了新的成绩。此外,张先生多年来一直参与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丛书”的评审工作,多次担任富布赖特项目的面试专家,以不同的身份,为中国美国史学科的发展做着相同的工作。

张友伦先生的学术著作,也体现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与卓越成就。在学术生涯的最初二十年,他重点研究国际共运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其中《共产主义者同盟》(1971年)、《第一国际》(1971年)和《第二国际》(1972年)就是张友伦先生撰写的,彼时他还承担着繁重的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工作,但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张先生仍专注写作,笔耕不辍,成果显著。1977年转治美国史后,张先生的学术兴趣集中在美国工人运动史。2022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张友伦文集”,由《美国工人运动史:1607—1918》《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美国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美国西进运动探要》《张友伦史论集》五卷组成,收录张先生所著的多部学术著作及四十余篇学术论文,是他毕生治学精粹的汇集。这一文集的编辑与出版,对于系统梳理张友伦先生著述及中国美国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早期研究情况,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以及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前几年,张友伦先生的两位弟子李剑鸣和原祖杰,将先生的口述整理成自传体回忆录《云淡风轻话平生》(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全书分为“早年生活”“留学苏联”“南开岁月”“赴美访学”“学术生涯”五部分,涵盖张先生近九十年的人生经历。对于深入了解张先生和他同时代的历史学者,提供了一个具体切实的样本。

作为张友伦先生的博士生,我曾有幸领略过先生授课的风采。他上课不用讲稿,不仅能够脱口讲出历史事实的具体年月日,而且能记住一连串的数字。每次下课铃一响,准是他的最后一句话,一秒钟都不拖欠。对待学生他既严谨又宽厚。如今,九十高龄的张友伦先生享受着云暖风轻的晚年生活。2020年5月先生生日之际,我曾赋打油诗一首,今惶惶献上,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风轻云淡笔耕勤,顶天立地炳功勋。五月鲜花送吾师,九旬华诞隐重望。(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学人小传】

张友伦,1931年生,四川成都人,我国著名美国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家。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美国史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期担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基地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及顾问、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美国研究》编委等。撰写和主编的学术著作、教材和工具书二十余种,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数十篇论文。曾参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编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通俗历史读物行销百万册。著有《张友伦文集(五卷本)》。

我第一次见到叶嘉莹先生是在1982年3月31日,是在北京海淀区刚刚建成还未正式营业的燕山宾馆。那天我陪同父亲周汝昌参加叶先生亲自召集的会议,内容是敦促诸位同仁全力搜集顾随先生的遗著遗稿,准备为先生出版文集,希望能共襄此事。在这次会议上,我初睹叶先生的风采,领略了她的魅力,同时也有幸见到顾随先生的其他弟子:吴小如、杨敏如、郭预衡……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会议开至中午方结束。那时候,叶先生还未回国定居,但她每次回来,心心念念的就是为先生出版文集。

以后,凭借父亲的关系,我与叶先生有了进一步的联系。比如,为父亲递送书籍;到过察院胡同23号,那是叶先生原来居住过的一个很大的四合院落,后来拆掉了,至今我脑海中还留有它的模样;电话里也常常是叶先生先与我通话交流,娓娓之声,十分亲切;父亲诞辰时叶先生也不忘来电话祝贺……叶先生的热情、温婉,让我感受到暖意盈盈。

叶先生与父亲同是顾随先生的门生,他们互称学长。父亲对叶先生原本无所知,早岁于蕙师(顾随字蕙季)诗集中见有“和叶生韵”“再和叶生韵”,就写信给老师,说:“叶生者,定非俗士。”叶先生也原本不认识父亲,至1980年在国际红学会上见面后,两人才有了相互交往。1980年4月,父亲收到叶先生从温哥华寄来的一册《迦陵存稿》,后来又收到《迦陵论词丛稿》,这是国内出版的她的第一部著作,父亲读后很快就此书写了一篇书评《愿抛心力作词人——读〈迦陵论词丛稿〉散记》,刊登在《读书》杂志上。内有一段话这样说:“她是一位学者,但她同时是一位诗人;是一位史家,同时也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她的论文,既能考订,又能赏析;既能议论,又能启迪。我以为这样的几个条件或因素,很难凑泊在一人身上。”

1980年6月16日,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开幕,全球有九十多名代表出席,盛况无比。父亲得以与叶先生会面,彼此相见恨晚,共同缅怀恩师顾随先生。父亲为叶先生书写了一张咏曹雪芹的条幅,上面的一首诗是:千年一见魏王才,落拓人间未可哀。天厚度卿兼痛幸,地钟灵石半庄谈。朱灯梦笔沉残稿,翠笔寻痕涨锦苔。曾是青蝇涂白壁,为君游说任渠猜。

会议结束回国后,恰逢父亲新著《恭王府考》出版。父亲虽与叶先生有同门之道,但父



陋室德馨(中国画) 曾昭国

满庭芳

第五三〇九期

叶嘉莹先生在忆中

周伦玲



·响晴轩续话·

亲在燕京大学,叶先生在辅仁大学。辅仁大学的女生部,就设在恭王府。父亲想叶先生必然熟悉那时府中情景,奉寄一册,当能引起她的回忆。又因为叶先生是一位诗人词家,父亲遂生一念,想请她为此话题赋以咏。不料叶先生竟欣然于腊鼓催年的时节里,写了回信并作了三首五律。现一并录于此:

近接学长近日出版的新作《恭王府考》一册,嘉莹于四十年前读书辅仁女院时,日夕游处其中,书中所言天香庭院等场景,思之如在目前,学长言之娓娓,证之凿凿,读之既弥增怀旧之思,更不禁对大观园当日种种情事生无数遐想,使人情移神往。考证之作,写来如此生动,钦佩不已。

汝昌同门学长近著《恭王府考》一书以府邸为《红楼梦》中大观园之所本,嘉莹于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间在辅仁大学女院读书时,曾朝夕游处其间,读汝昌学长对府邸环境及景物之描述,觉旧游踪迹如在目前,因致书相告,汝昌学长既复长函,更赐七律华章索和,珠玉在前,未敢步其原韵,因别为五律三章奉答。自知不工,聊书所感云耳。(本段为诗题,编者注)

飘泊吾将老,天涯久寂寥。诵君新著好,令我客魂销。展卷追尘迹,披图认石桥。昔游真似梦,历历复迢迢。

常忆读书处,朱门旧邸存。

天香题小院,多福榜高轩。慷慨歌燕市,沦亡有泪痕。平生哀乐事,今日与谁论?

四十年前地,嬉游逸曲栏。春看花朵朵,诗咏竹竿竿。所考如堪信,斯园即大观。红楼宽阅历,百感益无端。

这三首诗意境高远,情味弥咏,父亲读后深为感动。叶先生笔墨运用自如,无意雕绘,而情真意切,特别是读过她的著作、了解她的身世的人,更能体会出句中所包含的复杂而深刻的感情。后来《恭王府考》增订再版为《芳园筑向帝城西》,叶先生又赐以《红楼宽阅历——应周汝昌先生之嘱讲述六十年前在辅大女院恭王府读书之琐》为代序,增添了精彩的亮点。

父亲是红楼迷,他一生对《红楼梦》痴迷、痴情、痴绝。凡是和父亲打过交道的朋友,总少不了收到父亲的“拜托”“嘱托”,都给予过父亲事业上很大的帮助。1981年,父亲给叶先生写信,请她帮忙复印哈佛《懋斋诗钞》。4月份,终于等到了叶先生寄来的复印件,打开看时却是京本,父亲不禁大失所望。随后叶先生来信即言,已再托哈佛复印。至11月份,叶先生托哈佛胡女士寄来厚厚的《懋斋诗钞》复印件,终于来到父亲手边,让父亲十分感动。

我最后见到叶先生是在1991年11月于北京召开的“顾随诗词学术研讨会”上,先生精神矍铄,风采依旧。父亲因身体欠佳未能赴会,我把父亲的书面发言交给叶先生读过,她叮嘱我一定要照顾好好父亲。这些年,我一直在整理父亲的诗词,其中有很多顾随先生与父亲的诗词唱和,本想整理出来后请叶先生赐写一篇序言,后来看到叶先生高寿,事务太重太繁,实不忍去打搅,竟错过了最好的机缘。

应该说,是叶先生对先师顾随的热爱、推崇,把顾随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叶先生走了,但她依旧在我们的心里。
题目:1980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参加国际红学会议期间,周汝昌(右)与叶嘉莹初次见面

吕碧城与中国近代女学

李小茜

吕碧城(1883—1943)一名兰清,字邀夫,号明因,后改为圣因,晚年号宝莲居士,安徽旌德县人。她出身于晚清一个传统书香门第,因缘际会成为《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后出任北洋女子公学第一任校长,时人称她“北洋女学界的哥伦布”。作为创办中国女子学校的前驱,吕碧城身体力行推动了中国近代女学的发展。

中国近代女学发轫于上海,1898年6月,经正女学(后更名中国女学堂)在沪开办,彼时南方女学氛围高涨,而北方未成气候。直到1904年9月,在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天津道尹唐绍仪等官吏的赞助下,天津公立女学堂成立。1904年11月7日,天津公立女学堂(后定名北洋女子公学)在天津河北二马路正式开学,吕碧城任总教习,负责全校事务,兼任国文教习。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公立学堂,其成立彰显了当时天津女学的蓬勃发展状况。

北洋女子公学虽系官绅捐款合办,但与中国女学堂这种家塾式的私立学堂一样,自筹阶段始,就广泛利用新闻媒体,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宣扬女学之必要。吕碧城在北洋女子公学以及后来的北洋女师范学院任职的8年间,陆续在《大公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敬告中国女同胞》《教育为立国之本》等多篇女学论,以女性身份表达了开女智、兴女学的主张与见解,构建了一整套个人完足“女学论”(学者夏晓虹语)。以吕碧城这一系列文章为代表的“女子论文”的出现,代表了20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的重要转向,即女性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说理文体,反映了当时女性自我革新、由家庭走向社会的历史潮流。

晚清女学的兴起是带有经世务实色彩的,如夏晓虹所言,此时提倡女学的最高宗旨乃是救国。吕碧城拜严复为师,汲取了罗兰、卢梭等西方思想家关于“天赋人权”的平等思想,在当时的北方首倡女学之必要。她把对女学的追求上升到维系民族国家、救亡保种的层次,“夫强国之道,固以兴学为本源,而女学尤为根本之根本,源头之源头”“吾国人数四百兆,女学不兴,已废其半”,提出男女应“合力以争于列强,合力以保全我四百兆之种族,合力以保全我二万里之疆土”的宏大目标。吕氏把女学与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意在表明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已经成为时代、民族的必选项。她用自己的职业化道路将女学教育的意义具象化,对全国女学事业的发展起到榜样之效。

吕碧城认为女学不单是为了启迪女童的智慧,更是为了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她提出“男女受同等之学业”,认为女性应与男性一样接受无差别的教育,反对将女学囿于培养传统贤妻良母的目标,而是应将女性培养成为合格的女国民。女子教育的宗旨是要造就“对于国不失为完全之国民”“对于家不失为完全之个人”的一批新型人才。她认为,中国要强,就必须开发女子之智力,实行男女平等,维护女子的权利;国家要强,就必须以教育人才为首要任务。

1911年,北洋女子公学并入北洋女师范学院。吕碧城在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上,提出让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的方针,把近代女学纳入了现代教育的轨道体系之中。“故以今日女子之教育,必授以世界普通知识,使对于家不失为完全之个人,对于国不失为完全之国民而已”“女子自立之道,以实业为基,学业之学,以普遍教育为始”。在办学过程中,她把“普遍学”即现代学科的基本知识作为根本,旨在为女子提供与男性一样的生存知识与技能,方能实现自养,立足于社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来源于19世纪英国教育家斯宾塞,以培养身心健全的人才为目标。女学不单是女性教育,最重要的是教会女子独立、自养。从北洋女子公学到北洋女师范学院,从总教习到监督(校长),吕碧城在当时这所北方女子最高学府待了8年,这里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此学习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等,为后来的五四妇女解放运动储备了不少人才。

总之,吕碧城的女学理念最核心的点是落实到女性如何自立、自养,从根本上解决女性的生存问题,以图实现女性真正的崛起,与男性一道共同成就民族的未来。从吕碧城本人来看,她既有中国传统才女的特质,又有着对自由平等理想的追求,是近代女性自我革新的典范。细读吕氏的文章,她的很多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和主张,对于当下女性的个人成长、自我实现、家庭关系等都有可参考的价值。

《信条》: 荷兰的时空逆转游戏

刘燕凌



上映于2020年的电影《信条》,是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近三十年来争议最大的一部。拍摄时剧组工作人员说,他们像是在完成导演脑子里的工程学实验。演员们更是实打实地拼,比如有一场高速追车戏,剧组封锁了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一条8公里长的高速公路,为了配合影片“时间逆行”的原理,动用了数十名顶级特技车手进行真车逆行拍摄,而且是以接近百公里的时速。诺兰不仅坚持全实拍,还叠加了“时间逆行”的设计,再一次把电影实拍的难度推向了新的高度。实拍虽然能呈现真实感,但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高昂的成本。像《信条》这样的全实拍作品,不仅需要巨大的投入,更需要无数人一起坚持,这也是诺兰电影独特魅力的来源。

《信条》的投资超过两亿美元,本来被制作公司寄予厚望,结果只收获了3.65亿美元票房,投资方华纳兄弟十分不满。后来诺兰转投环球影业,带来了“核爆大片”《奥本海默》。“电影就是一种操控。”这是诺兰非常认同的一句话,来自英国导演艾伦·帕克。而诺兰一直坚持让观众意识到这种“操控”,他希望通过诚实的设计,把观众带入角色的情感世界,让观众主动去体验光影世界,沉浸在于时间和情感的迷宮中。

12月7日22:22 CCTV-6 电影频道与您相约《信条》,12月8日15:00“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明清时期出现了“天津关”一词。明代天津关主要是指北京西侧长城沿线的一座关隘,清代天津关主要是指天津收税的关税,且由于时间长、影响大,今人所熟悉的天津关即是指天津市的关税。作为关税的天津关已经不存在了,但长城沿线的天津关依然屹立在山间,本文重点介绍长城沿线的天津关。

天津关位于今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是京西古道上的一个关口,在柏峪和沿河城之间的山口,关口旁存有百米方圆、石墙围绕的驻兵遗迹。元代《析津志》中称天津关为“天津岭口”,也为天井关,俗称天星关。明初《图经志》载,天井关山在京西220里,山顶有径,高3里,其下为关口,名曰:天井关,历代王朝在此设关建隘,派兵驻防,旧可通行,今皆因石垒壁闭,都指挥使司拨军把守。天井关于明景泰二年(1451年)建有正城、堡城,北过门、守口官公廨,直到清末尚有“额外外委”领稍人驻防此地。古道旁,当年的马圈,明代二道长城、摩崖石刻保存完整,巍然屹立于群峰之上,成为风景优美的凭古吊今之处。

《明史·卷四十·志第十六》记载天津关在良乡境内,书中说天津关也名天门关口,此种说法和最新编修的《长城志》相关记载不符,《长城志》记载天津关和天门关口是相距不远的两个关口。据《甘石星经》记载,天津、天门为邻近的两颗星星。根据《长城志》记

载,在天津关附近,还设有天门关、西龙门关、天桥关口(东龙门关)、东小龙门关等一系列用龙、天等命名的关口。《长城志》记载的内容与《甘石星经》星象图有异曲同工之处,加之天津关也曾名“天星关”,很可能长城命名时参考了占星命名。笔者推断,这一系列命名与东方属苍龙的星象划分有关。

典籍里的天津(六)

长城沿线天津关

冯志远

天津关在明代被称为“紧要”外口,它位于进京古道和内长城的接合部位,是外敌突破长城防线后,西山防线防御西北来犯之敌的第一道边关。金朝末年,元军曾数次从天津关威胁北京,可见天津关在军事上对于拱卫北京的重要作用。金朝皇帝在此设置车驿,供人员进出京城时休息使用。在京张铁路通车之前,北京与张家口间的交通主要走京西古道和关沟。随着火车的开通,古道迅速衰落下去,然而在其沿线留下了大量的军事关隘和明清古村落,成为时间的遗迹。

清乾隆时期《天津县志》在卷首《凡例》部分记载“天津本近口关名,在良乡北,自永乐置卫,遂移直沽”,即表明天津关是天津之名的由来,虽然没有说明此种说法的来源,但凡例作为一本志书的点睛之笔,应该有其相应的依据。道光年间《保甲图说》一书,对天津取自“天津关”这种说法给予了肯定。



沽上丛话